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5-9245,CN 65-1039/G4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疆界与生成要素  
作者：冯月季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21124.001  
收稿日期：2022-11-16  
网络首发日期：2022-11-25  
引用格式：冯月季. 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疆界与生成要素[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21124.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疆界与生成要素

冯月季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中华文化符号”作为综合性概念,具有丰富的意涵,要将其置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这一时代语义框架理解,明确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主体、阐释主体、哲学基础以及指称对象。在此基础上,文本从符号系统角度把握中华文化符号的外部边界,从符号类别和文化类型角度把握中华文化符号的内部边界。通过考察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要素,为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符号、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符号系统;符号类别;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23)01-0000-12

## 一、引言

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载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塑造中华民族形象过程中具有根基性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就中华文化符号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成果丰硕,总体而言,主要包含三个主题。其一,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基本概念的界说,认为“中华文化符号指的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突出而具有高度影响力的象征系统”<sup>①</sup>。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符号是指中华民族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它是中华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sup>②</sup>。还有学者

将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结合加以界定,认为中华文化符号是“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理念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民族范式独特性的标识性符号和形象”<sup>③</sup>。其二,依据不同标准和原则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类型划分,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角度,将中华文化符号划分为语言文字符号、政治象征符号、仪式庆典符号、地理节日符号、话语范式符号,等等<sup>④</sup>;依据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其划分为神话符号共同体、历史符号共同体、语言符号共同体、艺术符号共同体,等等<sup>⑤</sup>;根据符号表意类型将中华文化符号划分为像似符号体系、指示符号体系、

收稿日期: 2022-11-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机制研究”(21BMZ1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冯月季,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 阮静:《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文化传播》,《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② 朱麟:《对外传播视野下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③ 曾名、龚婷、戴登云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民族学刊》,2021年第7期。

④ 谢清新、王成:《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机制——基于卡西尔文化符号学的启示》,《晋阳学刊》,2020年第4期。

⑤ 胡仕坤:《文化符号视域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

规约符号体系<sup>①</sup>。其三,阐释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以及传播国家形象过程中的理据、作用和机制,此类研究成果颇多,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中华文化符号对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发挥的意义机制和功能作用。虽有部分成果涉及中华文化符号的类型划分,对中华文化符号作了概念界定,但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本体研究依然欠缺。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华文化符号概念的界定较为笼统,缺乏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深入探讨。“中华文化符号”作为概念组合,各个概念单元都具有丰富的意义内涵,但其组合命名的依据和逻辑尚未得到充分论证,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华文化符号的类型划分出现庞杂繁多、边界不清等现象。中华文化符号研究作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应注重对其基本概念有效性进行论证和分析,使其理论建构和实践维度获得充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中华文化符号概念的内涵进行解释,探讨中华文化符号的边界,阐释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要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符号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传统、价值内容、生成机制、演变规律、存在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探索在新时代语境下通过中华文化符号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路径。

## 二、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

明确中华文化符号内涵是确定其边界和生成要素的前提。“中华文化符号”作为组合概念,每个概念单元都具有丰富的意义内涵,“中华文化符号”概念同样蕴含极为宽广的意义外延。学者关于“中华文化符号”的每一种定义均指明中华文化符号的若干本质属性,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界定中华文化符号的概念要从两个视角出发,

一是在综合已有定义基础之上进行相应的完善补充,以期对中华文化符号内涵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阐释。二是中华文化符号概念的含义较为宽泛,要获得充分的意义阐释必须将其置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sup>②</sup>这一时代语义框架,才能彰显其意义的一体性与多元性、系统性与结构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等等。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中华文化符号是由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各民族共享,承载中华文化价值,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符号系统。这一内涵,明确了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主体、阐释主体、哲学基础和指称对象。

### (一) 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主体

马克思认为:“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sup>③</sup>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还通过意识和精神活动创造了璀璨的文化符号以满足心灵与审美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sup>④</sup>中华民族在创造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必然融入文化符号的意义内涵。历史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意义不断演化,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sup>⑤</sup>

中华民族的“自在性”,首先指向地理空间层面的中华民族内在的生成性特征,周朝时期出现的“中国”概念兼具地理空间和权力中心的双重含义。“中华”一词最早出现在晋朝,从“中国”与“华夏”中各取一字称之为“中华”<sup>⑥</sup>。此后,“中华”与“中国”逐渐具有相似的含义,在历史的延续中其内涵逐渐扩展,除最初的地理空间和王权中心外,还被赋予一种文化内涵,正如意大利人利玛

① 陈文婷、王仕民:《中华民族共享符号体系及其象征的再生产》,《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120页。

⑤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⑥ 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1期。

窦 (Matteo Ricci) 所言:“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 (Ciumquo) 或中华 (Ciumhoa), 第一个词表示王国, 另一个词表示花园。”<sup>①</sup>“花园”作为一种象征, 一方面, 指中华文化对华夏民族具有吸引力并得到华夏民族的认同; 另一方面, 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 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sup>②</sup>在包容多元的基础上显现的一体性, 将中华民族牢牢凝聚在一起。

中华民族的“自觉性”, 是在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相互审视和比较中生成的。20世纪初, 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之后,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语境的演化, “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不断拓展, “现今之中华民族, 自始本非一族, 实由多数民族混和而成”<sup>③</sup>。至五四运动时期, 基本形成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20世纪80年代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凸显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凝聚力。中华民族从“自在性”到“自觉性”的过程, 是中华民族包容并存、和合共生的文化精神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 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符号独特的意义内涵。

## (二) 中华民族及世界各民族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阐释主体

中华民族既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主体, 也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阐释主体, 创造和阐释都属于人的实践活动范畴, 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体现。一方面, 在阐释中华文化符号意义的过程中, 中华民族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信仰, 获得民族主体性存在的根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sup>④</sup>中华民族作为集合性主

体, 在创造文化符号的过程中逐渐生成民族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个创生、建构、发展、变化、维护的过程, 同时也是个体和集体在此来认知、评价、共鸣、认同的过程”<sup>⑤</sup>。由此可知, 集体记忆具有自觉性意识, 是内含反思性的民族文化自觉, 其本质是文化认同, 是中华民族基于共同文化根脉形成的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 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过程, 伴随地理、疆界、民族、文化等各种边界的不断突破, 使其传播到世界其他民族国家, 推动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互鉴与文化交往。马克思在论述世界历史思想时指出,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相互往来改变了各民族的自足状态, 民族文化被纳入世界文化的范畴, 但世界文化不是对各民族文化的消弭, 两者应是辩证统一的共存。从历史上看, 中华文化符号凭借独特的魅力吸引世界各民族的关注和欣赏, 表明中华文化符号蕴含的精神价值与世界各民族的审美需求具有共通性。世界各民族阐释中华文化符号意义的过程, 也是体味本民族文化特质的过程, 此精神交往既能在思维意识层面维系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又能从多元性的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抽象出某些共同的品质,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财产”<sup>⑥</sup>, 进而推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融合。

## (三) 共享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哲学基础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类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实践活动创造文化, “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 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 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sup>⑦</sup>。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 同时是文化的生产者, 文化由人民群众共享。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sup>⑧</sup>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文化共享的权利和机会, 通过文化共享

①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③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④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⑤ 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⑦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⑧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推动对文化的认识并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完善,进而开展更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sup>①</sup>。文化共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文化共享哲学为人类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共享也是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先哲“天下为公”的理念体现了对人类共生共享的孜孜追求,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的“乐忧天下”观念,荀子的“天下之人有所共予”<sup>②</sup>命题,都强调和合共生的“与他人共在”思想,“儒家十分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分享就是要求大家对自己的利益的让渡,这是建立共同体的重要基础”<sup>③</sup>。此外,墨子主张“兼爱”,庄子宣扬“齐物”,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和共享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sup>④</sup>这种朴素的“天下情怀”或“世界主义精神”构成新时代人类文明交往观的精神底色,“人类文明交往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便是相互尊重、和谐共生”<sup>⑤</sup>。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载体,在创造和生成过程中必然会将共享理念融入符号意义体系,体现出崇尚自然、尊重他人、包容共存、和谐向善的文化价值取向,并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符号对话过程中展现勃勃生机和持久魅力。中华文化符号具有的共享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 (四) 中华文化符号的指称对象是中华民族形象

符号的表意结构包含能指和所指,意指作用具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观的视觉形象(能指),第二个层面是在视觉形象基础上联想出的意义解释、判断和认知(所指)。当“中华文化符号”

这一集合概念出现时,首先指向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视觉形象。例如,黄河、长江等自然地理符号,孔子、孟子等历史人物符号。符号的视觉形象在人们头脑中被直观的感知,使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是人们通过符号进行思维意识活动的第一步。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结并非是任意武断的,尤其在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中,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共同构成符号能指和所指联结的意义来源,成为民族形象建构的文化根基。因此,中华文化符号的指称对象是中华民族形象,是在直观视觉形象基础上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形象首先表现为一种内部认知,即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sup>⑥</sup>。文化认同的意义根源来源于文化符号系统,中华文化符号蕴含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共识和心理情感,个体意识只有融入中华文化符号的意义系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和谁同在”的身份认同才能找到答案。除身份认同外,文化认同维度还包括“意识形态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生命意义确证等方面”<sup>⑦</sup>。中华民族在创造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形象自我认知的心理和情感基础。

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形成中华民族形象的外部体系,即国际形象。世界各民族通过接受和阐释中华文化符号,建构起关于中华民族形象的认知和判断。中华文化符号蕴含的深厚历史传统和思想价值是中华民族树立国际形象的文化底蕴,这一文化底蕴具有历史连续性,决定了当代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② 《荀子》,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69页。

③ 千春松:《儒家“天下观”的再发现》,《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④ 《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光明日报》,2014年5月16日。

⑤ 谢清果:《文明共生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⑥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⑦ 邢媛:《文化认同的哲学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页。

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sup>①</sup>文化符号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是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sup>②</sup>。

### 三、中华文化符号的边界

#### (一) 依据符号系统性确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外部边界

明确中华文化符号的边界,为中华文化自主性的建构提供合理依据。划定中华文化符号的边界,首先要考虑中华文化符号的系统性特征。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存在于兼具一体性和多元性的中华文化符号系统中,符号于系统不是单纯自在的,系统内在的规律赋予符号某些共同品质。中华文化符号的共同品质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sup>③</sup>。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中华文化符号系统内部存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这种差异性和多元性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体性和整体性之上,各民族为中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贡献力量和智慧,“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sup>④</sup>。在创造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实践中,不同民族形成水乳交

融、休戚与共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国家意识以及共同的价值信仰。

中华文化符号承载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发展史,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sup>⑤</sup>。共同的历史记忆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自然地理、文化遗迹、英雄人物和文化艺术等符号系统中,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符号功能除具有指称对象外,更重要的在于唤起情感,中华文化符号凝聚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能够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sup>⑥</sup>。中华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浓厚的“大一统”思想和“天下一家”观念,形成了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确立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⑦</sup>。中华文化符号蕴含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信仰,“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sup>⑧</sup>。共同的价值信仰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文化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的根本。

中华文化符号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征体现出的共同的历史记忆、民族情感、国家意识和价值信仰,构成确定中华文化符号外部边界的原则和依据,中华文化符号的价值体系呈现鲜明的民族独特性,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形象标识,是塑造中华民族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17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第 32 页。

④⑥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⑤ 《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1/content\\_5412300.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9-07/21/content_5412300.htm)。

⑦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https://www.neac.gov.cn/seac/c100500/201406/1085609.shtml>。

⑧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时效性》,《光明日报》,2017 年 1 月 7 日。

文化身份认同的基因和根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sup>①</sup>。中华文化符号独属于中华民族,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系统,构成了中华文化符号系统的外部边界。

## (二) 依据符号类别确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内部边界

如果以符号系统论视角可以确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外部边界,那么,在中华文化符号系统内部,根据符号类别可以划定其内部边界。明确中华文化符号内部边界的意义,有助于整体把握中华文化符号的秩序和结构,即厘清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渊源、构成基础、创造过程、生成要素以及存在形态,是我们应有的一种文化自觉。费孝通认为,要做到文化自觉首先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清楚地知道本民族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特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铭记和认知,构成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文化的历史性表现为对民族精神的继承,文化的社会性指“个人进入集体创造成为社会的共识,个人进入社会创造文化的过程”<sup>②</sup>。人的主体意识融入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形成客观理性的反思,为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创新寻找合理性、切实可行的路径。

依据符号类别确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内部边界,这一符号类别指符号的物质化程度,人类世界中大多数的符号有具体形态的物质载体,这些物质载体被人类赋予意义而符号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作了区分,自在自然是未经人类实践改造的自然存在物质,“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sup>③</sup>。人化自然是人通过劳动使自然存在物对象化,对象化的自然存在物

是对物质实体的一种抽象化和符号化,恩格斯也指出:“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東西。”<sup>④</sup>人类的劳动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生产工具进行物质生产,第二个层面是专门性的精神生产,继手工业和商业之后出现的艺术和科学等精神活动,其中,艺术是包含实践和生产劳动内容、通过精神形式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将人类的物质实践分为三个层面,即自然物质维度的世界、社会生产维度的世界和精神生产维度的世界。恩格斯认为:“所谓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sup>⑤</sup>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物质实践“三个世界”的阐释为符号类别的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符号与物质实践的关系可将符号分为三类,分别是自然存在物符号、人工制造物符号、艺术想象物符号。

自然存在物符号是中华文化符号系统中最初级的符号,山川河流、动物植物等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任何物都可能被人类意识符号化,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人类社会诞生之初,最先从自然中获取经验,“经验既是关于自然的,也是发生在自然以内的”<sup>⑥</sup>。恩格斯指出,自然的进化是人类产生的前提条件:“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⑦</sup>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从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5000余公里的范围内,以黄河、长江流经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形成了多样的文化形态,使中华文化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如今,黄河、长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理符号,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孕育了四大发明、文字、

①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修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②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8页。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⑥ [美]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艺术、礼乐等思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和魂”<sup>①</sup>,“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sup>②</sup>。

人工制造物是人类通过双手劳动或使用工具制造的,最初用于使用目的的物品。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人工制造物中的部分或全部实用功能逐渐弱化,被人们赋予某些象征含义符号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人通过实践劳动将自在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的过程,“它乃是人类历史实践所形成、所建立的感性中的结构,感性中的理性。正因为此,它们才可能是‘有意味的形式’”<sup>③</sup>。历史上凝聚民族情感和文化精神的物品,在历史进程中其物质形态消失或失去实用功能,但被符号化后携带的特定意义内涵永久存在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sup>④</sup>历史上被符号化的人工制造物以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形式留存,要通过各种形式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和展示,“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sup>⑤</sup>。

艺术想象物属于人工制造物的范畴,艺术品的生产过程离不开人的创作。马克思认为,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活动的一部分”<sup>⑥</sup>。审美是艺术的根本属性,艺术生产是超越功利性和实用性的自由想象活动。人工制造物最初作为器具被使用,艺术品显然不具有这一功能。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探讨艺术作品的本源时指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物因素,但艺术的本质是超越物因素之上的真理的生成和发生,这是一个想象性的沉思世界。艺术的

想象性使人类能够摆脱现世物的存在具有超越性,这正是中华文化符号、尤其是包含其中的艺术符号特有的精神内涵,是中国艺术精神中最具独特性的内容,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恒久的影响力。中国艺术精神是在原始先民与自然相处俯仰天地过程中生发的主体诗性意识,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虚静无为。“中国的艺术精神,追根到底,即是庄子的虚、静、明的精神。”<sup>⑦</sup>使心灵诗意地栖居,是中国艺术符号精神和价值的重要彰显。

### (三) 依据文化类型确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内部边界

除依据符号类别确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内部边界外,还可依据中国文化的类型确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内部边界,有助于在不同语境下对中华文化符号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进行比较和反思。按照历史分期,中国的文化类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鸦片战争前形成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一种是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中国近现代文化。依据两种文化类型,可以将中华文化符号划分为古代文化符号和近现代文化符号。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历史传统被打破后一直谋求现代性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伴随对文明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不断思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格局下,中国主张文明互鉴,不同文明形态融合共存,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构成文明进步发展的基础和底色。因此,在强调多元共生的新文明观的同时,要思考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使其在构建新型文明形态的历史语境中出场并显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进程中通过劳动实践创造的宝贵资源,具有丰厚的个体价值、社会价值、国家和民族价值。中国古代文化符号中的四大发明、哲学思想、语言文字、艺术精神等广泛传播,“不仅为

①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水资源开发与管理》,2019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光明日报》,2020年11月16日。

③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5页。

④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当代党员》,2020年第24期。

⑤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4期。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⑦ 徐复观:《徐复观杂文——记所思》,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54页。



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sup>①</sup>。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人类是在继承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运动性和创新性,认为一切存在物“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sup>②</sup>,“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sup>③</sup>。因此,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面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辩证统一问题。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sup>④</sup>。

中国近现代文化符号包括革命文化符号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符号。革命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征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和发展的符号体系,主要包括革命遗址和纪念地符号,例如,瑞金、井冈山、大渡河、遵义、延安,等等;革命遗物、纪念物和纪念日符号,例如,旗帜、雕像、武器、制服、建党日、建军日、国庆日,等等;英雄人物符号,例如,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白求恩,等等;革命文化艺术品符号,例如,小说、诗歌、歌曲、绘画作品,等等。革命文化符号形成了包含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等在内的伟大建党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的,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sup>⑤</sup>。中国近现代文化符号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内涵。

总体而言,与中国古代文化符号相比,中国近现代文化符号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有研究发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中,

当代文化符号普遍落后于传统文化符号,换句话说,与中国古代文化符号受到推崇相比,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的影响力亟待提升。”<sup>⑥</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语境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同时,要致力于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符号的创新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尤其是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展现时代价值、具有思想性和创造性的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sup>⑦</sup>文化最重要的作用是心灵的陶冶和心智的栽培。因此,在创造文化符号的同时,要考察如何赋予其具有中国时代精神和价值的文化内涵。

从这一意义而言,将中华文化符号分为古代文化符号和近现代文化符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价值的前提下,创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符号系统。钱穆认为:“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sup>⑧</sup>文化符号的创造,并不是将传统文化的内容简单嫁接到现代社会的符号形式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不存在不被思想把握的时代,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sup>⑨</sup>为创造现代文化符号提供了理论根基,人的主体意识可以在与现实存在的互动中创造特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将为中国现代文化符号的创造提供价值源泉和思想动力。

#### 四、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要素

考察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要素,有助于理解中华文化价值内涵的生成机制,为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和创新寻找恰当的结合点,处理好传统文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②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733页。

④ 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9年第12期。

⑤ 汤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红旗文稿》,2019年第19期。

⑥ 程曼丽:《中国国家形象符号的拓展与更新》,《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5期。

⑦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scio.gov.cn/31773/31774/31783/document/1451734/1451734.htm。

⑧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弁言第1页。

⑨ 杨淑静、吴友军:《重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视域中的“时代精神”》,《晋阳学刊》,2021年第1期。

化价值融入以及注入新时代精神的辩证关系。根据现代符号学的观点,人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人不仅使用符号进行交流,还具有创造符号的思维,“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sup>①</sup>。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必然会将结构性的社会关系以某种抽象的形式加以表现,因此,符号在生成过程中会受多种要素影响。考察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多种要素合力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和发展。

### (一) 劳动生产要素

任何符号都是在“物因素”基础上展开的表意活动,“物因素”是人类社会中的劳动对象,通过劳动生产,人们创造出具体形态的物质,并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将物质中的某些“物因素”抽离,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内涵使之符号化。从符号的生成过程可以发现,劳动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强调,整个世界历史都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产生。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面向的对象是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sup>②</sup>。人类在现实的自然界生活,必须首先创造满足物质生活的生产资料。

中华文明孕育之初,因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因素制约,面对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人们将黄帝称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带领原始先民进行劳动生产,种植五谷、发展畜牧、养蚕制丝、制造车船。中华民族原始先民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以获得满足生活需求的生产资料,同时,生发对自然的敬畏意识和浪漫想象。无论是儒家的“敬天意识”,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都将天或自然视为超越现世存在、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空符号,天或自然作为世界的“道”不可言说,没有明确的符号形式,但天或自然在现实中却有意义所指,具有伦理关怀和道德意识,生成中华民族原初的

文化心理结构。

从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历史实践看,物质劳动生产本身孕育精神劳动的内容。例如,黄帝时代养蚕制丝的最初目的可能出于满足穿衣的物质需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丝绸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具有文化象征含义。丝绸的符号化过程建立在劳动生产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sup>③</sup>即劳动生产为物质的符号化提供潜在可能,将物质劳动提升到精神劳动层次。马克思所言的精神劳动是建立在物质劳动基础之上的智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是精神、观念和思想的生产,物质开始携带某种特定的意义感知趋向于符号化。

### (二) 语言文字要素

人类通过劳动创造满足生活需求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产品,也在劳动过程中产生语言。马克思认为,人类语言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的交往需求,随着物质生产和人类关系的日益密切,人们需要创造一种具有普遍表意的符号进行对话。根据语言学的观点,语言产生于人类的姿态对话,语言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通过语言交往使社会过程进入个体经验之中。语言符号在社群中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的意义,正是语言的普遍表意特征生成早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语言交流,民族共同体成员具有更多合作劳动的可能,可以运用语言为自然界万物和人类自身创造的事物命名和分类,还可以运用语言进行意义和情感表达,创造新的符号,世界可以被人类思维把握为抽象的形式,换言之,世界被符号化。

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重要。”<sup>④</sup>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符号中重要的符号系统,《周易》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⑤</sup>从“仓颉造字”的传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1-202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页。

④ [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38页。

⑤ 《周易正义》,王弼、孔颖达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说可知,汉字产生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考古学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劳动生产过程伴随文字创造,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竹简上刻画的符号被认为是最早的汉字。汉字是中华文化符号系统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sup>①</sup>中华文化中的所有符号系统都是基于汉字符号系统生成的,龚鹏程认为:“构成中国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都处在中国文字符号系统的组织和制约中。”<sup>②</sup>因此,可以认为汉字符号系统是中华文化符号系统的元符号,以汉字符号系统为圆心,建构了中华文化符号多层级的表意结构。

### (三) 民族交往要素

随着劳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语言文字的出现,各族群和民族之间交往日益频繁,推动文化之间的融合,创造并生成新的文化符号表意体系,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质是民族交往融合的表现。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昆仑山被称为中华民族创世的起源地,也是中华玉文化的发源地,随着民族迁徙,玉石和玉器向中原地区传播,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贤哲开始赋予玉人格化的意义阐释,认为玉的温润和参透天地之道是君子高贵品德的象征。可以说,正是民族迁徙和交往使玉被赋予独特的符号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中华玉文化形成的时期,还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和丝绸通过民族交往传播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时期,青铜器和丝绸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符号。纵观中华民族历史,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异彩纷呈、多元共生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

民族交往可以从中华民族内部扩展到世界其他民族,有力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sup>③</sup>。自汉代起,中国的丝绸、瓷器、家具、艺术品等沿着丝绸之路运往世界各国。16-18世纪,欧洲兴起“中国风”,激发西方人对中华文化强烈的好奇心。当时的欧洲学者

如此评价中国:“这个国家就在短时间内成了智慧、美德和良知之所在,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其统治最为开明长久,其道德最为高尚、美好,其法律、政策、艺术、工业同样如此,堪为世界各国的楷模。”<sup>④</sup>欧洲的艺术家和工匠极力将中华文化中显现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精神融入绘画、建筑、宫廷物品的生产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生成了对中华文化的异域想象,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家具、艺术品等成为象征中华文化精神和艺术风格的符号。“中国风”在海外的流行不是偶然现象,19-20世纪,中国的汉字、戏剧、绘画、哲学等同样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文化和艺术。及至当代,中国的影视作品、国潮产品、应用软件等在海外广受欢迎,为打造更具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文化符号奠定坚实基础。

### (四) 媒介记忆要素

中华文化符号并非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劳动创造的全部,部分劳动创造的物质或文化已经消逝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传承的文化符号离不开媒介记忆的作用,文化符号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能够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情感,将历史传统、神话传说、文化精神和个体身份相结合,这一切都建立在媒介作为集体记忆承载物的基础之上。“文化记忆的内容只有借助于媒介才能过渡和转换成文化层面的集体记忆,为个体所分享,并发挥其作用。”<sup>⑤</sup>可以说,人类文化演进的历史就是媒介技术变革的历史,依靠媒介,人类创造的文化才能摆脱物质形式的制约,转化成抽象的符号形式储存在人类的记忆中。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看,媒介技术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人们通过结绳记事的方法记忆神话传说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其后,又使用兽骨、陶器、青铜器、竹木简等作为媒介材料。文字的发明为人们的文化记忆提供更多新的可能性。德国媒介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对于记忆媒介的研究必须要从文字出发,并且不仅要从它的社会和技术维度,而且要从它的

① 《习近平在俄罗斯“汉语年”开幕式上的致辞》,http://www.gov.cn/ldhd/2010-03/25/content\_1564218.htm。

② 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自序第5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④ [英]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⑤ 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记忆的成就出发。”<sup>①</sup>文字的书写将人类文化记忆推向新的维度,文字书写既作为一种技术性媒介,同时,倾注了书写者的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因此,文化记忆不是单纯的“记住”,媒介的记忆再现是一个回忆、重构和创造的过程。

媒介记忆的首要功能是将符号文本化,通过符号在媒介物上的书写和展示实现。文本化的过程使被记忆的对象摆脱物质载体限制,转化为抽象的符号形式。能够进入媒介记忆层面的文化符号,说明其对人类具有特殊意义,例如,中华文化符号中的神话传说,当前人们之所以通过各种现代媒介技术再现这些文化符号,在于人们需要在神话传说中获得寻根意识,将当下与传统勾连并在对未来的思考中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媒介记忆具有的时间性,可以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与更新,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媒介技术的融合,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生成具有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化符号。

#### (五) 艺术审美要素

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显现出对艺术审美的需求,通过与自然的互动,人类的生命意识与自然形式相互凝聚,通过巫术礼仪孕育朴素的审美情感和艺术想象。中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陶器表面普遍刻有鱼纹符号,象征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神圣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鱼纹符号既体现一种独特的形式美,同时,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审美意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原始图像,并经过抽象化形成具有独特意味的符号形式,这是艺术审美心理积淀的过程,“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便是积淀: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sup>②</sup>。马克思认为,人面对的首要对象是自然,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感性活动,艺术审美正是建立在这种感性活动基础之上。

艺术审美的感性活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体现,“此自由感即美感的本源。这一自由感又不断在创

造中建立新的度、新的美”<sup>③</sup>。艺术审美的感性的自由活动赋予人类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感性的自然抽象为表意符号,在历史演进中通过艺术想象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解释。例如,女娲是中华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在《楚辞》和《山海经》等文学作品中作为神话传说存在,曹植《洛神赋》对女娲神话进行艺术化叙述,“神话的深沉蕴涵逐渐淡化,转而积淀为一种艺术形象,成为文学家状物夸张,驰骋想象的素材,女娲与音乐的关系,经曹植的生花妙笔后,成为一种美妙音乐的形象符号,反复出现于后代的文学作品中”<sup>④</sup>。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从诗歌、戏剧、小说、影视等领域针对女娲形象的艺术创造从未停止,赋予女娲形象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艺术审美具有一种元符号能力,推动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此过程中,通过艺术审美和想象创造出形式多元、蕴涵独特的艺术符号。

#### 五、结 语

作为中华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形式载体,中华文化符号凝聚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在中华文化符号形成的历史传统中,找到共同的文化根脉,清楚我们从何而来,进而确证一种共创、共享、共传的文化身份和情感纽带。中华文化符号还能建构一种当下的“我们感”,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符号的对比中明确我们是谁,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拥有怎样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诉求。中华文化符号还指向时间的将来,引起我们对中华文化传统和现状的反思,思考生命个体的文化形态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基于此,对中华文化符号内涵的理解、边界的划分和生成要素的厘清尤为必要,不仅有助于从观念上整体把握中华文化符号的形式和意义,还能在实践层面为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符号、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①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页。

③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页。

④ 宁稼雨:《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曹晶晶]

[责任编辑: 王文秋]

中国知网